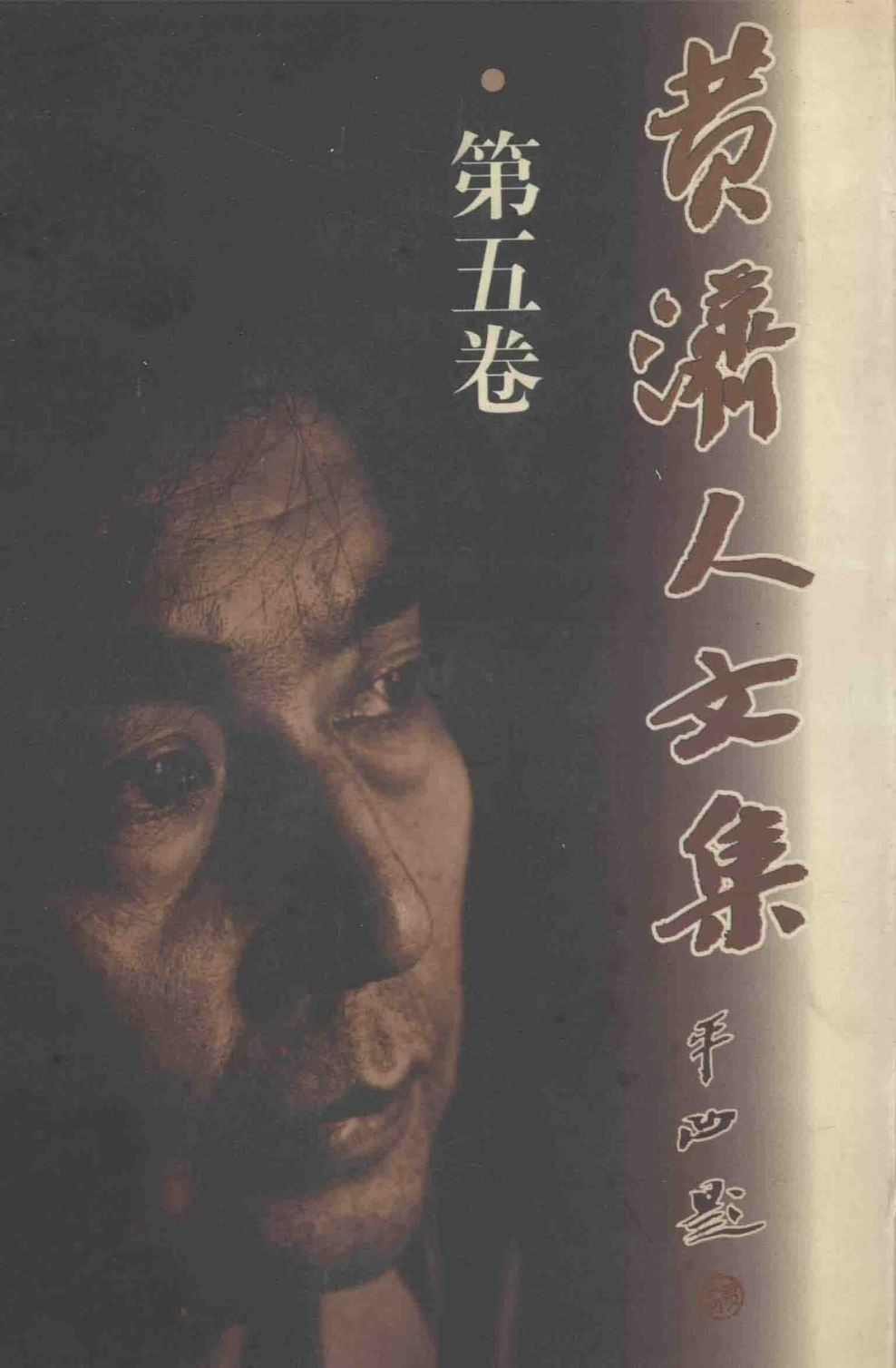


黄潇人文集

平西题



● 第五卷



黃濟人文集

• 第五卷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济人文集 第5卷/黄济人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ISBN 7-5366-4690-9

I. 黄…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302 号

责任编辑 薛相林

封面设计 邵大维

封面题字 贾平凹

封面摄影 田捷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黄济人 著

黄济人文集(第五卷)

HUANGJIREN WENJI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6 字数 42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690-9/I·907

定价:30.00 元

自序



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历史将来评价我们。我把过去的作品编成文集,为的就是将来的目的。

1999.7.9

目 录

三十八级台阶	1
人格的力量	299
镇山剑	315
山城, 有一片沙漠	335
康福来启示录	353
归宿	371
巴山夜雨	389
散文十五则	467

三十几级 台阶

(上)

1

一级、两级、三级……

当我平生第一次从天安门广场径直朝着人民大会堂的东门拾级而上的时候，禁不住两眼朝下，全神贯注地在心里数着那一级级熟悉而陌生的台阶。我想，我是下意识的。我只不过通过这种幼稚的好奇举动，来表达自己对一座神圣的殿堂心仪已久的感情。

我是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据这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云，总数接近三千的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684名，知识分子代表697名，干部代表733名，解放军代表267名……我既非军人、干部，也非工人、农民。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我所在的单位是重庆市文联，所从事的职业是专业文学创作，所担任的最高社会职务是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所以，我想，我大概归属知识分子代表罢。

然而，倘若没有人告诉我，我却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如何当选的。那年元旦刚过，我在成都参加四川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所

在的界别(共青团、工会、妇联)小组召集人,是担任着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四川省青年联合会主席的黄女士。她即是省政协委员,又是省人大代表,所以稍后两天当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召开的时候,她需要两头跑会。一日,黄女士刚从人大会上回来,便把我从政协会小组讨论会上拉了出去:

“你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哩!”她站在楼梯过道上,用一种惊喜的口吻说:“今天上午人代会印发了四川的两百多位候选名单,嗯,这是机密材料,会后要收回的,所以我不能带来给你看,但,你尽可放心好啦,重庆方面推荐提名的,肯定少不了你!”

我一时愣住了。眼睁睁地望着黄女士推门进屋,自己却怎么也挪不动腿。我不存在放心与不放心的问题,于我而言,事情完全是突发的,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唯有感觉,便是一股强大的暖流在包围着我,在蒸腾着我,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头上正顶着一轮火红的太阳。又一日,也就是省人代会完成了所有选举任务的那个下午,行色匆匆的黄女士再一次把我拉到会议室外边的楼梯过道上。

“你们单位是怎么搞起的?莫非你得罪了什么人不成——”黄女士这次脸色颇有异样,口吻更是大相径庭,“跟你说嘛,你们单位推荐了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梁上泉。梁上泉的推荐材料写得才好哟:全国著名诗人,诗集出了好几十本,所以他以高额票数当选了;可是你呢?材料上写的是重庆市文联《红岩》编辑部编辑,出的书也只是一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送给我的书中,不是还有另外三本《崩溃》、《征夫泪》和《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吗?唉唉,你看这事情搞的……”

在黄女士的长叹短吁中，我已经做好了落选的精神准备。人非木石，我倒不是那种真正沉得住气的人，我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对单位对领导的充分的信赖上的，就是说，我不曾得罪过什么人，什么人也不曾修理过我。因为退回去两三年，我确乎只是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作家呀，那个时候，我确乎只有一本书而没有四本书呀。况且，推荐材料上即使按照眼前的情况写了，就其影响、成就以及知名度而言，我与梁上泉也确乎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曾记否，当年他的《红云崖》唱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我还是石头城下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儿哩！

黄女士又说话了：

“嗯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当选了。只不过……只不过按照得票多少为序，你成了四川两百多个当选代表中的最后一名……”

乍暖还寒，亦悲亦喜。从黄女士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中，我虽然为自己缺乏竞争力而羞愧难当，甚至为殃及朋友与青年联合会的脸面而无地自容，但，我唯一能摆脱尴尬与窘境的理由，竟和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发生了联系。那就是，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采用的都是等额选举，而到了第七届，我们这一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中，终于有首次差额选举的实施。生逢其时，躬逢其事，宁做凤尾，不做鸡头，我应该感到自信与骄傲才是！这样想时，头顶上的太阳虽然落坡了，然而有一轮皓月却钻出云层，光如水泻，柔如雪飘，挂在我的眼帘上的，是满世界的清亮，满世界的透明……

从成都参加完四川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返回重庆不几天，我收到了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寄来的用大红颜色印制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通知书》：“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你为四川省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资格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后确认。”确认之前,我却需要到广州去,为花城出版社修改一部已通过他们初审的书稿。就在改稿期间,1988年3月14日,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看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台湾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的决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等31个选举单位分别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2970名代表的资格有效,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代表名单是以新华社的名义在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占了整整一个半版面。当我在四川省203名代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先前的一种惴惴不安竟顿时变作了此间的另一种惴惴不安。不是么,我的名字先后两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一次是关于拙著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的消息,一次便是这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单。在我的

理念中,这两次是构成了因果关系的,而其间存在的问题是,前一次倘若可以算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话,那么后一次,则是无功受禄、不劳而获呀!而且,始所未料的是,后一次比前一次更能够影响我的平静的生活,几乎从正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天开始。

那一天,我收到重庆市文联党组王书记以他个人名义拍来的电报:“祝贺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请速离穗返渝,准备赴京开会”;那一天,我书的责任编辑带来一位“健力宝”集团公司的部门经理张先生,张先生代表公司送给我一套印有“健力宝”字样的运动衫,并嘱我在方便的条件下,穿着这套运动衫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然后拍张照片寄回广东来。

我当然知道,我熟悉的王书记也罢,我陌生的张经理也罢,他们都出自于公心,怀揣着好意,然而,无可讳言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解释,其自身就闪烁着耀眼的光环,比太阳火红,比月亮洁白,比太阳与月亮的交织还要绚丽多彩。这样的职务,不是乌纱帽,却胜似乌纱帽,它的职权,便是你的尊严,它的义务,便是你的荣誉。官运亨通者,可以连升三级,从一个小小老百姓到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我大概明白,我还是从前的我。我珍惜我不曾有过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我第一次坐上专列;从成都到北京的航班,我第一次坐上包机;更有那从驻地宾馆到天安门广场,前有警车开道,后有救护车压阵,浩浩荡荡的车队在十里长街上全线绿灯……

呵呵,人民大会堂,我千里迢迢赶来,为的就是直奔你去的。当

我拾级而上，登完三十八级台阶的时候，你可否像敞开大门那样敞开你的心扉，告诉你的神圣，连同你的神秘？

2

胸前佩戴着正面印有国徽、镶嵌了照片、填写了姓名和选举单位、背面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章以及编号的红底白边的出席证，始得在身着便装的门卫的眼皮底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门。与门外春寒料峭、北风凉冽相反，门内是竟是一个热浪蒸腾、人声鼎沸的世界。

宽敞的灯火辉煌的前厅，摆满了供代表们临时饮茶、休息的桌椅。工作人员则穿梭在两三千位代表中间，来回递送着茶水和毛巾。有记者调查过，凡遇大会，由于每个茶杯都要经过清洗、消毒、漂洗三道工序，他们翻腾茶杯就得万次以上，而所提供的茶水，每次需茉莉花茶十公斤，八个锅炉的饮用水，重达二十多吨；前厅南侧的邮电所，也是个人头攒动的所在。代表们在这里争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纪念邮票、首日封，赓续寄给各自的弟兄叔伯、至爱亲朋。根据集邮者的说法，这些珍品只有加盖了当日的人民大会堂的邮戳，方才能够具备真正的收藏价值。有记者调查过，那天短短一小时，三个邮筒里的信件竟然不下八千封之多；当然，尤以为众的足以与人山人海交相辉映的，还是代表们手中各种类型照像机的闪亮登场。富丽堂皇、气象万千的人民大会堂，每个角落都是难忘的画面，鲜艳夺目、晶莹剔透的服饰与首饰，每位少数民族代表都是合影的搭档，于是此起彼伏，于是熙熙攘攘，于是在我荒唐的幻觉和联想中，这里竟成了中国最大的茶馆，最大的集

市,以及虽然不大然而最为时尚的旅游胜地……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近日在《南风窗》杂志上读到的留美学子胡学华给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这位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了下面一段话:“像全国人大,几千人,好像很有代表性,但一年开不了几次会,开会也很难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像美国的参议院,参议员不过 100 人,每人都配备办公室,有秘书和咨询研究机构,天天开会,研究很多问题,众议员也不过 300 多人。”)

诚然,也许人民大会堂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是,追星族能够追到人民大会堂里来,却是不曾想到的。这不,那边,福建代表郑美珠被一群代表围着签名,急得她直喊:“让我先把信发出去好不好?”尔后,这位排坛女将鱼跃般地冲出人墙,才把早已捏在手上的首日封投入信箱;这边,安徽代表马兰刚进前厅,就被另一群代表认出来了,“咦,这不是电视连续剧《严凤英》里的严凤英么!”于是请签名,请合影,把这位二十出头的黄梅戏演员折腾得满额大汗……

人民大会堂里的追星族,当然只是近三千人民代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阶层。而另一个部分,另一个阶层所追逐的其他明星,人民大会堂里也能够做到各取所需,应有尽有。前厅中,但凡拥挤处,只要你踮起脚跟伸长颈子往里瞧,保准你可以见到以前只能从报纸和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数学家苏步青,经济学家厉以宁,国画大师关山月,体操王子李宁,香港的实业家霍英东,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宋世雄,以及我们这个行当的重量级人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

电铃突然响起来。虽然它不知被安放在前厅的什么位置,但只

要它连响三声，人们就会按照它的指挥迅速通过左右两侧依旧站有便装门卫的两个大门，进入人民大会堂里。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座位是固定的，人手一本的报到卡夹内，表明着你的席次与排号。但唯有今天的大会预备会议可以例外，例外到原本应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王震、李鹏等等也坐到台下来了。以后才知道，他们今天的坐法是正确的，因为至少在此刻，大会主席团的名单还没有付诸表决呀。

人民大会堂里的真正的明星应该是政治家。代表们对于政治家的崇拜与追星族对于偶像的崇拜其心理因素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各种门类的偶像们仅仅有如主席台前沿的鲜花，那么恍若大会堂屋顶那一盏盏明灯的，则是我们当今的政治家无疑了。然而，说来奇怪，只有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台下而没有坐在台上的此刻，我才从眼睛的光芒里而不是头顶的照耀中，看见了政治的大门，正在向人民打开……

主席台上坐着上一届，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他的主持下，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了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由 162 人组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含现任与前任者）27 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15 人，中央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 34 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代表 15 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代表团负责人 32 人，而来自基层的企业家、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和知识分子等各界代表人物则多达 39 人，就是说，在主席团成员比例的分配上，人数最多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

这就是那些政治试卷的答案么？我蓦然想起书本上的文字来，诸如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原则，诸如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制度,而直言其事且明确具体的,恐怕就是我国《宪法》中的条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置身在一种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感性的互换之中,我不觉在心里说,中国的政治已经从教科书上走下来了,伴随着人民代表的步伐,已经走进人民大会堂里。

彭真仍然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当主席团成员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本届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里、习仲勋、乌兰夫等 17 人后,他站起身来,以一种肃穆的语气宣布,“主席团常务主席已经推定,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祝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随即,彭真和不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成员们开始退场。在会场上再次响起的掌声中,万里同彭真紧紧握手,紧紧拥抱。我坐在主席台下,虽然无法听见此时此刻他们两人各自都说了些什么,但,从翌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他们拥抱时刻的大幅照片看,各自的话题我敢肯定都与中国民主进程的接力棒已由一个历史阶段交接给了另一个历史阶段有关。

现在坐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位置,继续主持着将要通过二十三项会议程的预备会的是万里。这位当年的安徽省省委书记出现在今天的主席台上,就其新的历史的开篇而言,是颇有象征意义的。《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通讯里写道,“八十年代升腾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民主意识,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古老的黄土地上孕育着的亿万农民的经济民主意识。一位对政治学颇有研究的人大代表说,‘研究中国的民主,不能

不从农民追求经济民主破题’。1978年,正当八亿农民在贫困、狭窄的‘胡同’里徘徊,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为了生存,把田地偷偷地分了。来自安徽省的人大代表回忆起这次举动,津津乐道,‘这可是农民找到的一个能决定自己的事情的地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开始自主经营’……”

是的,如果说古老黄土地滋生的经济民主意识,激发了民众对政治民主的追求,那么正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城市经济体制也被猛烈地摇撼了。承包、招标、破产、兼并……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切,都刺激着人们传统的民主思想定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而过去是不敢的,什么都不敢。在我生活的重庆,以一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口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经济的改革试点。于是西方人士也承认,“在中国,民众已开始具有敢于在政治上直言的开放心理”。

这种开放心理简直如同宇宙一般,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就看有什么容器来把它装下了。这样想时,顿觉置身其间的人民大会堂虽大,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过是一座小小的房子。“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中国诗人艾青在他早年的一首诗里的句子。

3

万里站起身来,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体起立。奏国歌。在这之前,他宣布了另一件事情:应到代表 2970 人,实到代表 2892 人,